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守正创新中让文学与时代同行

□于永军



文化的发展贵在“守正创新”。我们今天在新的起点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精神,在守正创新中让文学与时代相融同行,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文学作品。

在守正创新中回答文学的时代课题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路径在于,结合新语境用之直面时代课题。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课题。正确把握和反映时代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打通人民之间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美学经验,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也是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保持向前奔腾力的根本前提。重大现实问题反映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逻辑,蕴含着发展的新情况、新可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基于新语境展开新的实践,在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推动文化创新。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必须心怀“国之大者”,注重从时代之变中把握艺术脉动,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以精品力作彰显文学理想和文学追求,体现文学的时代价值。

回望历史,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广大作家以笔为旗,以多样的抗战文艺,召唤人民大众,进步分子积极投身抗战行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广大文学工作者紧紧围绕“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这一时代主题,积极深入斗争实践、生活实践,写出了不少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听到延河水的歌唱,可以听到为了和平、民主、自由、解放而发出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声音,可以看到党带领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峥嵘岁月。

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大文学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反映人民生活”的殷殷嘱托,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在表现建党伟业,反映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与重大成就,描写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表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城乡蝶变与山乡巨变,描绘先进英雄与时代楷模等多个方面,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呼吸,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新时代印记、引领时代风气的优秀作品,也使得新时代文学的使命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步履坚定地朝着璀璨的远方跋涉前行。

实践证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在破解现实问题和现实矛盾上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在直面时代课题中寻找文学创作突破点,把中国故事讲好讲生动,才能有效

激励广大人民更加自觉地坚定文化自信,自觉坚持走自己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力量得到越来越多的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就越焕发出光亮。

在守正创新中开辟文学的时代境界

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质是包容性,它以地负海涵的时代品格,张弛着宽广的胸怀,广纳新质,不断结合新质。这种“广纳”和“结合”,是扬弃,是吐故纳新,使中华文化在有效化解各种时代矛盾中不断开辟新境界,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延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就破解政权建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窑洞对”。面对如何“跳出周期率支配”的历史之问,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党找到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前瞻性的,不仅是思想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美学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状况,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向前推进。在新时代,我们创造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展现出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这召唤着广大作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中进行文学的创造,立足本土讲好中国故事,奋笔书写中华儿女在追求伟大复兴大道上的靓丽身影。这样的创作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的精神图谱,为世界读者所关注。

实践证明,“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来源在创新、在思想解放。置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广大作家只有在思想观念上与时俱进,真诚走向广阔天地,感受时代脉搏,汲取生活营养,接受精神洗礼,领悟生活真谛,在虚心向人民学习中确立主题内容,寻找典型素材,选取独特视角,才能积极发挥文学创作吹响时代号角、展现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帆的作用,真正赓续中华文脉,谱写时代新篇章。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瞭望台

改版之后的《诗刊》将不断就诗歌理论批评栏目“百家诗论”进行相关选题的策划与讨论,不断发挥其对诗歌创作的引领作用。尤其是每一期“百家诗论”都将头条推出“经典诗论”,即重点推送近现代以来的诸多名家关于古典诗词文化的经典论述,以“诗歌课堂”的形式让广大诗人以及读者朋友对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统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创刊67年的《诗刊》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使命就是赓续中华诗词文化的血脉,推进新时代诗歌文化的发展,写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诗歌篇章。《诗刊》2024年第1期“经典诗论”推出了叶嘉莹先生的《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之所以改版之际首先推出叶嘉莹先生谈论杜甫的这篇文章,其根本原因在于叶嘉莹就杜甫的诗歌创作及其成就谈到了自古以来一个极其重要的诗学命题,也即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深入互动,而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以及诗学研究者都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显然杜甫已经成为诗歌传统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的精神“知己”,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

叶嘉莹先生在文章中首先强调了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足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与此相应,唐代的诗苑缤纷绚烂,名家辈出、风格各异,而只有杜甫一个人可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诗人。究其原因,这体现在杜甫诗歌于体式、内容、风格尤其是在七律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为重要的则在于杜甫具有健全的才性——他的博大、均衡,在于他的修养以及人格所凝成的集大成之境界,在于他以深厚博大的意蕴继承传统与突破传统的精神,在于他随物赋形、包容万端的百科全书式的诗歌襟怀与世界观。

第一期推送叶嘉莹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杜甫以及唐时文化所构成的伟大诗歌传统并不是只属于封闭系统的“过去时”,而是与当下以及任何时代的诗歌创作以及整体诗歌文化时时发生密切而有效的深度对话关系。作为流动的传统以及精神共同体的杜甫总是能够轻易打通每一代人,他一次次重临于每一个时代的生存现场和诗学核心。这是诗人和时代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以及伟大传统。

质言之,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与杜甫的关系。甚至关于传统以及杜甫的深度对话不只是发生在我们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效力。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世界诗歌”以及汉学界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真切发现杜甫以及唐代诗歌文化在世界诗歌格局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杜甫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个人风格的代表,而是成为从古典诗学(传统)和古代汉语一路延续,回响到现代诗歌和世界诗歌格局中的重要传统和精神资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尽量以开放的文化视野重新审视、评估、理解和接受杜甫,“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中国学者有一种偏狭的心意,就是把中国古典文学视为‘我们的’(或者最多是‘东亚的’)传统,淡化‘外人’作出阐释和赋予意义的权利和权威。这种心意,恐怕会最终导致中国的伟大文学作品变成只有中国人自己才会去阅读和欣赏的文字,导致文化孤立主义,既不利于中国文化,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论》)

然而多年来,我们又一直处在“当代诗歌”缺乏经典的焦虑之中,我们也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方向性、总体性的写作者,即类似杜甫那样的终极诗人。这就要求当代所有的诗人要目光远大,在中国古典诗学、世界诗歌以及中国百年新诗的综合文化语境中不断打通、开掘以及创造历史,不断激活传统、当代以及未来的诗歌精神共同体,不断接续又开拓以《诗经》《楚辞》、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陆游等为代表的伟大传统。

质言之,对于当下本土的诗歌创作而言,杜甫以及唐代诗歌作为伟大的精神共同体以及传统,对诗人的才能、人格以及修养提出了可供参照的“高峰”,亦即诗歌与时代的互动、互启、互证构成了中国诗歌历史的主调,诗人的家国情怀、人民立场、现实精神、人格修养、历史求真意识以及文体更新、语言创造,成为任何一个时代诗歌的强大根基。

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着属于它的“杜甫”,杜甫是伟大的总体性诗人和精神共同体,每一代诗人都能够在他那里找到学习的源头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余光中、洛夫、西川、张枣、柏桦、赵野等诗人对“古典性”的重新发现,这一对话过程既是指向了时代与人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关涉诗歌语言和技艺自身的秘密。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反复校正和重估“传统与个人”以及“词与物”的关系,“传统”“个人”以及“词”和“物”都要经过现象学和考古知识意义上的还原、纠正。这是对惯性认识和传统秩序的拔正,是对熟悉之物进行摇撼或颠覆,诗人以此来重视词语和事物的本源和可能,进而重估一个时代的语言学、修辞学和精神现象学。由此,就不存在隔河对立、水火不容般的古典性和现代性,不存在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隔膜、龃龉,而是它们之间本来就是一体的,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机结构,正如我们不能荒唐而滑稽地认定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是两条不相干的河流一样。

循着这样的思路,《诗刊》第2期在“经典诗论”栏目推出了闻一多的文章《人民的诗人——屈原》。屈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诗人”,在于他的身份、“行义”、“人民的艺术形式”以及体现在节操、思想、诗歌内质方面的“人民立场”。明白了以上这一点,我们就会在屈原以及后世的杜甫等伟大诗人这里发现一个规律,即真正的诗人总是对世界、时代、人民予以及时的深度对话与“发现”,他们在语言、体式、技艺以及想象力方面也呈现出惊人的创造力。我之所以强调要从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屈原、杜甫以及当代诗人,意在提醒诗人要注重诗歌的难度,注重人格的修为,强化写作的效力和活力,要保持杜甫式的罕见而又可持续的创造精神。对于今天的诗歌,我们呼唤的是屈原这样的人诗一体的伟大诗人,我们呼唤的是杜甫“诗史”式的诗歌正道,我们呼唤的是目光远大、至大至微而又气象万千的诗作,我们呼唤的是求真、深挚、深情、向善美的诗风。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

「呼唤至大至微、气象万千的诗作」

兼谈《诗刊》的「经典诗论」栏目

□霍俊明



叙事伦理：关乎文学，更关乎生活

□于欣琪

当下,文学创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一方面,技术革命与媒介革命为文学生态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另一方面,价值冲突、思想分化又对文学创作构成了观念上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对“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深入探讨愈发显现出其重要意义:既能回归文学本体,又能够走出“象牙塔”内部的自我循环,触及社会现实的复杂状态以及作家心灵的各异趋向。

事实上,刘小枫在上世纪末出版的哲学随笔集《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中,就已初步阐释了“叙事伦理学”的基本内涵,并大致划分出了“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与“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两种现代叙事伦理,其论述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此后,从谢有顺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类型学界定,到张文红、祝亚峰对1990年代及其后小说“叙事伦理”的持续关注,再到曹金合对“十七年”农村合作化小说“叙事伦理”的系统阐释,以及黄擎、李云雷等对新世纪以来新兴的“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之“叙事伦理”的现象解读,“叙事伦理”探讨已然凝聚为一股有力量的反思潜流。

即便如此,创作界以及批评界对于“当代文学叙事伦理”问题的审视与反思仍然是不够的。《长城》杂志从2023年第1期起开辟的“当代文学与叙事伦理”专栏,集中刊发了张光芒、史鸣威共同撰写的系列文章,针对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平庸之恶”问题、人性隐秘的伦理叙事、“崇高”的叙事建构、“受难”叙事伦理、“道德绑架”问题、“生命·爱情·自由”的价值序列问题等,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

综观这一系列文章,可以发现,论者带着鲜明的危机意识介入到“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研究过程中。其研究并非由外部现实入手,宏观勾勒出“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时代转型与嬗变轨迹,而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出发,发掘文学叙事之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道德内涵、伦理倾向与价值立场,它们与当代人的社会现实生活、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深层精神构造相互关涉,表现出鲜明的内在性、主体性与深刻性。这一“文本本位”的研究态度使论者深入文学书写的隐秘地带,重探了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丰富性与可能性。

论者在文章中跳出既往研究的思维惯性,直指流行叙事的症结,以“后见者”的目光探求某种叙事成规的历史生成过程,反思一些文学叙事潮流的弊病所在。同时,秉持着“持续追问”的学术姿态,从文学叙事的表层征象进入到对文学叙事传统的深层探源,最终回到对人心人性的透视中。如《当代文学之人性隐秘的伦理叙事》一文,论者从鲁迅的小说《弟兄》切入,着重探讨叙事者如何在文本中展开对人性之善/恶本源的深度挖掘。这种窥探人性之“一念善恶”的叙事传统从“五四”时期延伸至当下,所关切的正是个体之人的精神困惑与心灵疑难。

对于“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追溯考察及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而言,乃生发于论者对于启蒙精神的继承与阐扬,因而其所追求的不仅是探索“何为文学”的话语定位,更指向“文学何为”的价值重估。论者力求将启蒙的“公共性”追求贯穿于学术思考的整个过程中,使文学探讨成为一种从个人出发走向外部世界的“公共实践”。基于此,论者格外关注到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伦理”之维,重视发掘

潜藏于文学文本之中的伦理内涵与伦理效力,重建文学研究的“内”“外”关联。

在《长城》的专栏文章中,论者聚焦隐匿于文学叙事与日常生活角落中的伦理之问。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古代“诗言志”“文载道”“思无邪”之文学传统,还是韦恩·布斯的“文学共导”原则、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说、阿伦特的“积极生活”论等西方现代学说,都体现出强烈的历史能动性与现实关切感,这意味着文学探讨不能局限于技术主义的形式探讨和封闭性的审美解读,而必须走出书斋、走出理论的高塔,回到常识、回到公共生活之中。同时,论者展开伦理阐释的研究路径在于深入辨析自我与他者、个体与人群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主体张力”是其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此外,论者展开伦理阐释的研究目的也十分明确,发掘出众多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学术论题。典型代表就是《生命·爱情·自由》一文,该文以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引,提出了此三种人生维度的价值序列在当代文学、文化中的变化,强调要重建“现代价值的金字塔体系”,进一步维护社会道德伦理秩序。

的确,“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探讨价值不仅关乎文学,也关乎社会;不仅指向思想,更指向行动;不仅在于言明现实,更在于想象未来。正如谢有顺所言:“生活的可能性”才是“叙事伦理的终极旨归”。(《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截至目前,这一研究领域虽成果频出,却依旧具有极大的探索空间,有待学者们进一步开拓。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